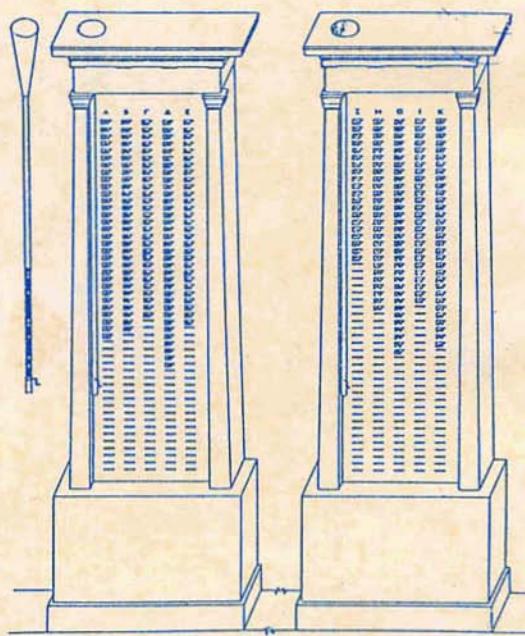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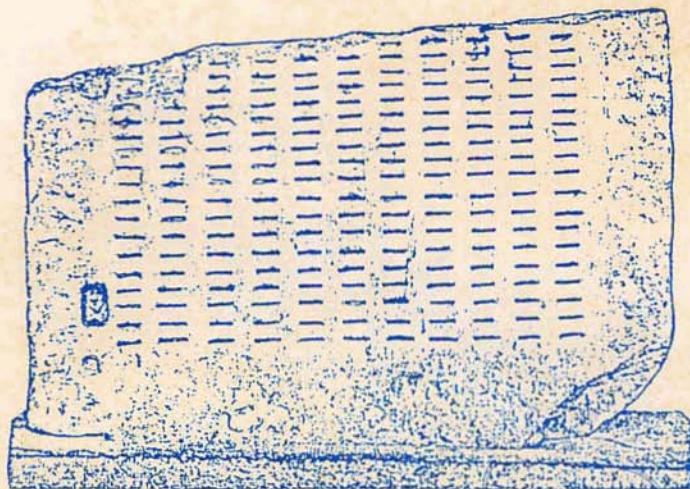


三、古希臘民主政治的制度及其涵義

一、

工業革命以後，人類經歷了隨着工業化大潮流而來的一系列的歷史巨變：資本主義的興起及其發展，不僅決定了近代世界主要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激起了莫大的反響；官僚制度的發展固然提高了行政的效率，但高度官僚制度化的趨勢却逐漸使個體淪為大社會的小螺絲釘；民主政治的普及更刻劃了近代社會及政治生活的主要面貌，但民意的被利用却也成為世界近代史上屢見不鮮的事情。在以上各項歷史性的發展中，對近代中國人的心靈撞擊最大，吸引力最强的恐怕仍是民主政治。追求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一直是近百年來國人共同的理想，這個偉大的理想使我們推翻了幾千年的專制政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的共和國，這是一項無與倫比的歷史性的成就。但是，自「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仍一直是國人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標，也一直是西方文化中對中國心靈產生巨大魅力的二大要素。時至今日，情況並無改變。本文的目的，不在於檢討形成這種情況的各種複雜的歷史原因，也不在於追溯近代史上民主政治運動的發展，而是企圖透



西元前第三世紀雅典抽籤任官制中所用的抽籤機（上圖）

及其復原圖（下圖）

過對古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回顧來檢討古代民主政治制度所蘊涵的精神。

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民主政治成爲一種政治生活的方式並不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後才忽然平地而起。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在許多方面均可以追溯到古典時代（特指西元前第八世紀至第四世紀）希臘城邦中所見的民主生活方式。對近代人而言，古希臘人的歷史世界一直具有永恆的魅力，也一直是一項永恆的誘惑。文藝復興時代的馬其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著「君王論」就一再稱引亞歷山大的史實來支持他的論點；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王子就手持骷髏遙念亞歷山大，思惟生命問題，大發思古之幽情；而哥德筆下的浮士德與海倫談戀愛一幕，尤可視爲古希臘世界對近代心靈的誘惑。美國獨立革命時期，新英格蘭地區人士就一再稱引闡發古希臘民主政治以及羅馬共和制度以爲借鏡。這種對古與的孺慕之情也常常在近代作家筆下流露。我們今天遙想西元前第四世紀雅典演說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 384-322 B.C.）在雅典的公共聚會場所（Agora）以動人心弦的語調對雅典人演講，反對馬其頓王腓力（Philip, r. 359-336 B.C.）的侵略，捍衛希臘民主自由傳統的情景；遙想西元前三九九年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爲他的蒙冤被判死刑作正義的辯訴；遙想晨光熹微中雅典公民聚集抽選政府官員，辯論城邦大政的情景，時隔數千年仍然爲之砰然心動，神馳不已。

但是，這樣一個令近代人發思古之幽情的歷史世界是靠什麼建立起來的？古典時代希臘民主政治的具體制度如何？這些制度對現代人類有些什麼永恆的涵義與啓示？除了浪漫的歷史情感之

外，這些問題也值得我們作理性及客觀的反省。

11.

任何一位史學工作者回顧一千多年前希臘的民主政治的史實，都會發現幾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第一，古代希臘的民主政治是在長期的試誤過程中希臘人以高度的理性與容忍的精神努力所得的成果。借用波柏 (Karl Popper) 的話，民主政治的成長可以說是一項「零碎的社會工程」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參看：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54, I.p.1.)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在「雅典的政治制度」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 by H. Rackha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一書中對民主政治的發展有很詳細的記載，他的分析帶有極濃厚的生物演化論的色彩，許多學者也指出亞里斯多德對民主政治發展過程的分析受到他自己的生物學說及哲學背景的影響 (例如 Mortimer Chambers 與 James Day 合著的 *Aristotle's History of Athen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66 就力主此說)，但是整個說來，古代希臘從王政演變為貴族政治，再變為寡頭政治，再變而為僭主政治，終成為民主政治，其過程是艱辛、緩慢而非一蹴而幾的。從整個演變的過程看來，最早有梭倫 (Solon, C. 640-560 B.C. 出任執政官) 當政時代人民之參與公民大會及法庭活動，獲得了必

要的參政素養，接着有克萊斯提尼 (Cleisthenes, fl., C. 500 B.C.) 之建立五百人委員會，落實民主政治的原則。於是才有帕里克里斯 (Pericles, C. 495-429 B.C.) 時代光芒萬丈輝耀千古的成就，帕里克里斯也才能理直氣壯地在「葬禮演說辭」中自詡雅典是「希臘的學校」。雅典幾百年來蘊蓄的國力至此達於頂峯，但也從此時起，一個以民主傳統相標榜的城邦漸轉變為名實相符的「雅典帝國」，這也是一項絕大的歷史的諷刺。

第二個引人注意的歷史現象是，古代希臘人並不是先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民主政治理論，才根據這個理論建立民主的政體。相反的，大哲如柏拉圖 (Plato, C. 429-347 B.C.)，亞里斯多德對民主政治均無好感，頂多把民主政治當作是腐化政體中之比較能為人忍受的一種而已 (參看：Aristotle, *The Politics*, IV:2)。在帕里克里斯死後不久，雅典一位佚名政治家就攻擊當時的民主政治實係一種不負責任的流氓政治，惡人在此種體制下悠游歲月，而好人則備受欺凌。
(參看：*The Old Oligarch, Be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 Ascribed to Xenophon*, tr. James A. Petch, Oxford, n.d.) 這種說法多代表貴族觀點，未免持論過於激越。但是，在古希臘上對民主政治作理論性、哲學性的反省多出現在民主政治發展至一定程度之後則是一項無可否認的事實。古代希臘民主政治毋寧是建立在幾項具體的制度而不是建立系統化的理論或學說之上。

古希臘民主制度包含多端，例如行政權操於由各部族抽選代表組成的「五百人委員會」手

中；各項大小官職任期極短，長不過一年，短則僅一日；立法權操諸公民大會手中，……等。但純就制度史的觀點而言，其中尤以陶片流放制和抽籤任官制最能刻劃出古代民主政治的實況及其所涵蘊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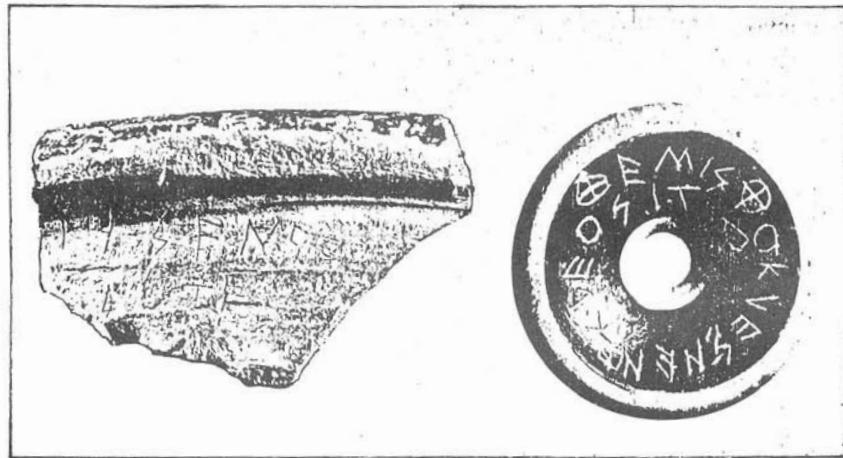
三、

在古典時代雅典民主政治的體制之下，除了軍事將領因具有高度的專業性質而由選舉產生之外，所有的政府官員均透抽籤方式選出任命。這項制度最能體顯古代直接民主政治的特質。根據古代典籍的記載（例如亞里斯多德的「雅典的政治制度」及「政治論」二書），以及近數十年來的考古發掘報告，我們知道雅典民主政府的行政部門的一般官員甚至連最高職位的執政官也由抽籤選出。每一位合法的成年公民都可在抽籤機內投下刻有他的姓名的木籤球，經公開抽選之程序抽中者則依法出任各項行政職務。伴隨着這項制度的實施，雅典城邦尚有幾項附屬性的規定作為它的安全瓣：一是在全體公民均輪過一次之前，任何人不得再次出任相同職務；二是所有抽籤選出的官員在正式行使職權之前均須經由五百人委員會或法庭對他的德行操守以及公民資格之是否合法二項再加審核；三是人民可以對任何官員提出彈劾，並得經由多數投票而免除其職位（參看：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44:1, 55:2, 59:2）。這三項安全瓣保證了抽籤任官制實施過程中的公正、公平與公開。

另外一項古代民主政治的具體制度就是陶片流放制（Ostracism，此制我國學界舊譯「貝殼流放制」係因希臘文之 Ostrakon 一字可作貝殼解，亦可作陶片解。但近數十年來之考古成果已證明流放投票均用陶片而不用貝殼，當改譯為陶片流放制，以符實情）。如果說抽籤任官制奠定了古希臘民主政治的制度性的基礎，那麼陶片流放制可以說是針對民主政治的人事因素而設計的安全瓣。每年的第六個月份（Prytanay），雅典公民均舉行公民大會表決是否需要實施投票以流放具有過度政治野心或有恢復僭主政治包圍的政客。如公意決定有實施此項投票之必要，則於同年第八個月份實施流放投票，每位雅典公民將他認為應予逐出雅典的政治人物的名字寫的陶片上投入特製的票櫃中，開票後獲選票達六千以上者則依法必須被逐出雅典十年，但其公民權及財產權並不予以剝奪。這項制度大大地減低了民主政治中政治家之個人勢力過度高漲以致危及城邦全體利益的可能性。（以上對這兩項制度僅言其大體，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拙著：古代希臘城邦與民主政治，臺北：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增訂再版）。

四、

古希臘民主政治體制中抽籤任官制，及陶片流放制的實施，有許多特殊於那個時代的歷史背景。例如：小國寡民的城邦格局使直接民主有實施的可能。在為數近千的希臘大小城邦中，面積大者不過數百平方英哩，小者則可以小至幾個平方英哩；人口亦然，最著名的雅典城邦在西元前



西元前第五世紀雅典陶片流放制所用的陶片

第五世紀總人口不過十二萬人左右，而具有參政權的成年公民僅有一萬五千人。斯巴達在近二萬的總人口中公民數目不過四、五千人之譜（以上根據 Victor Ehrenberg 氏的估計。參看：氏著，《The Greek State》，New York；W. W. Norton & Co., Inc., 1964, p.33）。在這種領土有限人口不多的背景之下，自然容易「因其俗而簡其禮」，民主政治之推行易收事半功倍之效；其次，古希臘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龐大的奴隸勞動之上的。大量的不具公民資格的奴隸擔當了大部份的勞力工作，使希臘人得有充分的閒暇與心力去從事民主政治的活動。

以上這些特殊的歷史背景均與近代社會迥然不同。近代社會中，人口的大量激增以及高度的流動性、都市化趨勢的加速發展、政治事務之複雜化與專門化漸使官僚政治成為專家政治……等重要的發展均使古代直接的民主政治在事實上及理論上均成為不可能。因此，代議式的民主政治乃隨着工業化而成爲近代社會的主要潮流。

古代及近代的民主政治雖因歷史情況不同而制度迥異。但是，古希臘民主政治制度中所蘊含的意義與精神則是普遍而永恆的。從這個角度來說，近代民主政治可以說是從古代民主政治制度中汲取了一部份精神泉源並賦予它現代意義。古希臘的抽籤任官制及陶片流放制對近代人而言至少具有以下兩項重要的涵義。

第一，它們體顯了政事取決於公意的原則。希臘文「民主政治」一字是由 *demos* 與 *cracy* 成。*demos*一字之字組義原指土地而言，至荷馬史詩時代以後逐漸演變爲指稱人民，梭倫開始用

此字來指與居於統治者地位的少數人相對的全體公民，此後這個字逐漸被用來指政治及社會意義下自覺性的公民羣體，這種用法至西元前第五世紀達於高潮，正與民主政治之實際發展互相呼應（參考：Walter Donlan, "Changes and Shifts in the Meaning of Demos," *La Parola Del Passato*, CXXXV, Nov. -Dec., 1970, pp.381-395）。cracy 則為「統治」之意。democracy 中多數人統治的含義由抽籤任官制及陶片流放制體顯無遺。抽籤任官制保障城邦的全體公民參政機會的平等，將整個城邦的公民融鑄為一心一德不可分割的整體。陶片流放制則取多數決之意排除任何野心政客。如此一來，政治既取決於大多數公民之公意，則人民的利益就自然成為一切政治措施的根本依據。

古希臘民主政治制度所蘊含的第二項意義在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及由此一涵義所引申出來的「政治公道與法治不可分」的原則。在古典時代的雅典，任何男子只要年滿十八歲，父母皆為公民，依法皆享有平等的參政權利。法律是保障個人尊嚴與平等權利的根本工具，所以法治就與民主成為一物之二面，不能分亦不可分。蘇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 B.C.) 的案子是說明政治公道與法治不可分這項原則最具啟發性的例子。西元前三九九年，蘇格拉底無端蒙冤，被控以不信城邦神祇、另奉新神以及腐化青年三大罪名。在帕拉圖筆下，蘇格拉底面對五百零一名由雅典公民所擔任的法官，以海潮音作獅子吼，莊嚴地為自己辯解，反覆剖析政治與道德之不相容，他形容自己是一隻附在馬匹身上的牛虻，拼其一生為維護城邦的公道而努力 (Plato,

Socrates' Defense, 30e-32)。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感人心弦的一幕用血和淚寫下的悲劇。但是，蘇格拉底仍被判死刑，羣情激憤。蘇氏被囚於獄中時，他的學生格列頓勸他逃亡，於是有了著名的「格列頓」(*Crito*)篇中的對話。蘇格拉底對他的學生剖析，法律是經由全體城邦居民所同意共同遵守，因此法律本身是公正的化身。使蘇格拉底蒙冤的是人而不是法律，所以不應逃獄而破壞法律所代表的公正（參看：Plato, *Crito*, 54, b-d.）。結果，蘇格拉底終於從容就義，坦蕩蕩地接受了死刑。蘇氏畢生所追求的是政治的公正，他對當時的民主政治並不滿意，而且一再地指出它的不合理，但是為了維護公正的原則，他把自己的生命都犧牲來維護經由全體公民同意的法律的公正性。

當然，古代希臘民主政治的實施有許多嚴重的缺陷與限制。例如佔城邦總人口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的婦女、奴隸及外邦人因為不具備公民權，所以也不得參與城邦的政治活動，所謂政事取決於公意乃取決於公民的公意而非城邦全人口之公意，這當然是對於「多數人統治」這項原則的一大諷刺；至於斯巴達人以掩殺奴隸作為訓練少年成長過程的一部份則更不人道而且與古希臘世界所追求的「公正」原則背道而馳了（參看：Plutarch, "Lycurgus," 收入：*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p.71.）。再說，植根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的制度無法絕對地免除人為的干擾，「大盜竊國」，「王侯之門，仁義存焉」，這都是人類歷史上一再發生的事實。史家修西的底斯（Thucydides）在「帕羅奔

尼撒戰史」(*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書中就指出帕里克里斯在雅典所肆行的實在就是一人獨裁的政治，玩弄民意於掌股之間。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卷第七，離婁章句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頁五五，上半頁），在人類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動中，制度與人事之配合猶如鳥之兩翼、車之二輪，不能分也不可分。古希臘民主政治固有制度上及人事上之瑕疪，但小瑕不掩大瑜，它所體顯的精神及其所揭示的原則仍輝耀千古，爲人類的政治活動提供了重要的靈感。

一九七八年歲末初稿於西雅圖